

侵华日军在华北制造“无人区”的几个问题

申玉山 赵志伟

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为了封锁、隔绝、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切断抗日根据地之间、抗日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曾灭绝人性地在华北大规模制造“无人区”。近些年来,史学工作者越来越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相继发表、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著述。但由于缺乏充足的文献档案材料,对于某些问题至今不甚清楚。笔者通过最近几年的努力,搜集、挖掘了相关的新材料,对其中的几个问题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兹分述如下:

一 日军在华北制造了那些“无人区”

侵华日军曾在长城沿线大规模制造“无人区”,现在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城沿线受灾各县的党史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调查和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学术界也出版了专著《千里“无人区”》(陈平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及文献资料《长城线上无人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等重要成果。但是,对于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的其他“无人区”,则仍鲜有人知,或知之甚少。实际上,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的“无人区”,除了长城沿线“无人区”外,还有相当多、相当大的“无人区”。

被侵华日军视为“华北治安最大隐患”的晋察冀边区,是侵华

日军在华北制造“无人区”的重灾区,尤其是山西、河北(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两市)两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对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进行了调查,主要有:(1)热南“无人区”:包括热河之承德、兴隆、平泉、青龙、滦平、凌源及河北遵化、迁安、密云等 9 县之大部,东西长 700 余里,南北宽 60 里。(2)热西察南“无人区”:包括热河滦平西部及丰宁县,察南之赤城以东平北密云等县之大部,东西长 200 里,南北宽 40 里,东面与热南“无人区”相连接。(3)晋东北“无人区”:包括山西平定之东北部、盂县之东部、五台之东部,河北平山之西部,计南北长 200 余里,东西宽五六十里。(4)、灵寿、行唐、曲阳“无人区”:系 1941 年敌人扫荡挖封锁沟时所制造而成,包括行唐、灵寿、曲阳沿沟附近 10 里以内村庄,这一“无人区”地带一年多后即被抗日武装所粉碎。^①

上述所谓热南“无人区”及热西察南“无人区”,首尾相接,东西长达千里,总面积达 5 万平方公里,因为它们都处在长城沿线,现在一般笼统地称之为长城沿线“无人区”或“千里无人区”。这是侵华日军在华北最早开始制造的“无人区”,也是面积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现在为世人所熟知的“无人区”。这里不再赘述。

对于上述所谓晋东北“无人区”和灵寿、行唐、曲阳“无人区”,人们尚了解较少。其中,晋东北“无人区”是 1941 年秋季日军实施所谓“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沿冀晋边界构筑封锁线时制造的“无人区”。^②此外,日军在封锁线外的阳曲、定襄、灵丘等县,也制造

① 《晋察冀边区“无人区”地区说明》,1947 年。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日军所谓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结束后,“驻山西日军第一军在其“作战经过概要”中,明确承认了制造“无人区”的事实:“此次作战虽未能予共军以致命打击,但在摧毁根据地及由于沿省境设立了无人区(真空地带),给共军极大的损害。”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第 1 版,第 437-438 页。

了大片“无人区”。如,在灵丘县,自日军1941年秋季大扫荡至1943年,全县93个村庄被制造为“无人区”。1943年冬至1944年春,为割断南山抗日游击区与川下敌占区的联系,日军又勒令靠近南山抗日根据地的20余个村庄进行“并村”。^①在定襄县,日军在1941年秋季大扫荡中,将八路军活跃的东南部山区的南涧、马家窑、瓦扎坪、西笏口等20余村全部毁灭,制造了长40里,宽20里的“无人区”。在与定襄县东南部山区相接的阳曲县东北部山区,也被日军制造成“无人区”,并且沿该县东部与五台县交界线向南延伸。据住冈义一供认,1942年1月下旬,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独立步兵第13大队第4中队曾把山西省阳曲县大盂镇东南方8公里处的山岳地带制造为“无人区”。这一地区以羊店为基点,东到离羊店约4公里的杨庄,南到离羊店12公里的大汉村,再从大汉村向东6公里到达日军33高地。在此山岳地带内的约20多个村庄全部划入“无人区”。^②与此同时,日军在晋察冀边区第2分区的寿(阳)榆(次)、山阴、崞县、代县,及第5分区的广灵、浑源、应县等地,也大量地增设据点、碉堡,制造“无人区”,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分割。如1943年5月,日伪大同、阳高、浑源、广灵4县“清剿队”在大同、阳高桑干河沿岸,开始进行长达3个月之久的清剿,在中共桑干河工委、武工队创建的游击根据地内实行并村,制造“无人区”,将120平方华里内的所有小村全部并入5个大村。1944年9月下旬,大同日伪在山阴县勒令天圪塔、南寺、水峪口、南周庄、沙家寺等11个村庄的居民全部搬到川下居住,将11个村的房屋在7天内全部拆毁。

所谓的“灵寿、行唐、曲阳”无人区,其范围实际上也不止这三

① 《灵丘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7月出版,第100至103页。

② 住冈义一的口供,1954年4月8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个县。据当年的《晋察冀日报》报导,从涞源西南直到娘子关,日军修筑了二条“封锁沟”,增筑堡垒、岗楼,仅自行唐至灵寿一段就筑了 35 个堡垒。在“封锁沟”外五六里路的地带都划为“无人区”,在“无人区”内敌寇大肆烧杀。仅行、灵、平三县就有 50 多个村子被烧成一片焦土。^①在与它们相连的平山县和井径县,侵华日军也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如在平山县,1941 年日军秋季大“扫荡”中后期,敌人为进一步隔绝根据地与游击区的联系,在其沿封锁沟、墙一线,在沟外十里内制造了“无人区”,范围涉及朱坊、田兴、西荣村、中荣村、南荣村、西苏家庄、侯家庄、柴庄、东庄、台头、西沿兴、北荣村、东荣村、北水、北西庄、东苏家庄、河西、屯头、东沿兴、南北马、西岸等 22 个村庄,共 10875 人,面积 200 平方华里。^②在井径县,1941 年 9、10 月间,日伪军对南北芦庄、大王邦、前头庄、掩驾沟、南北孤台、柿庄、三罗峪等 11 个村进行“扫荡”,造成了宽 10 里,长 30 余里的“无人区”。^③

除上述较大的“无人区”之外,侵华日军还在山东省和晋中、晋西北及河南省等地制造了大大小小若干块“无人区”。在山东,1942 年 7 月开始,日军集中兵力,向徂徕山区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日军在山区外围 160 余里处修筑封锁沟及碉堡、据点,沟内划为“无人区”,强迫民众搬家,不服从者残施屠戮。^④据广濑三郎(时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高级参谋、少佐,后升任中佐)供认,1942 年 8 月至 10 月,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五大队的一个半中队和步兵第一一一大队的一个中队,加上伪警察队,进行了一次“徂徕

① 《从涞源到娘子关的“封锁沟”的斗争》,《晋察冀日报》1942 年 2 月 10 日。

② 《当前平山“无人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42 年 11 月 11 日。原文见中共平山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平山党史资料》第 4 辑。

③ 《八年来敌伪对井径县人民的残酷暴行》,1946 年,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④ 《敌蚕食徂徕山的新花样》,1942 年 10 月 15 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山封锁作战”，在山区周围制造了宽 10 余公里的“无人地带”。把住在那里的和平居民赶走，修筑很深的封锁沟、炮楼，禁止中国人进入或通过这个“无人地带”。^① 在晋西北的五寨县，自 1942 年 12 月 5 日起，日军开始在三岔周围推行其灭绝人性的“无人区”政策，河底、庄窝、刘家庄等村尽成废墟。^② 在河南省，1941 年 4 月，日军分由邯郸、荷泽、开封 3 路奔袭高陵县沙区，为了彻底摧毁抗日力量，消灭人民生存条件，清剿抉剔，达 7 日之久，并以井足、千口、破车口、薛庄等村为据点，向四周各村实行“三光”政策，周围 142 个村无一幸免。其中，受灾最重的地方，东西宽有 20 余里，南北长达 30 余里，包括 42 个村，均造成了“无人区”。^③

二 日军在华北制造“无人区”究竟始于何时

关于侵华日军在华北制造“无人区”始于何时？过去学术界大多是依据残留下来的有限的档案材料，或建国后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进行判断推测，缺乏可靠的档案材料的佐证，因而难免会存在某些疏误，所以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考证。笔者综合搜集、挖掘的新材料，辨析如下。

如上所述，长城沿线“无人区”是侵华日军在华北最早开始制造的“无人区”。因为这一“无人区”系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分别在长城内侧、外侧共同制造，所以对于日军在这一地区制造始于何时，似应从这两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① 袁秋白、杨瑰珍编译：《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解放军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40 页。

② 《五寨敌肆行“无人区”政策》，载《新华日报》1942 年 12 月 26 日。

③ 《四一二日寇血高陵县之沙区》，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关于日本关东军何时开始制造“无人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始于 1939 年 11 月，其主要依据是建国后河北省兴隆县党史工作者的调查。调查显示：是年 11 月，为了覆灭活跃在热南山区和长城沿线的八路军游击队，伪满日伪将兴隆县蓝旗营子乡北榆树沟内几个小村落强制集并到杨树台；将横河川北部山区羊羔峪、水泉等 20 多个山村强制集并到安子岭、双炉台，将黑河上游的村庄强制集并到孟大地。但由于群众的激烈反抗和八路军游击队的有力支持，到 1940 年春，群众纷纷从集家点返回家园。^① 另一种说法是始于 1940 年冬和 1941 年春，主要依据是写于 1946 年 2 月的一篇关于滦平县“无人区”的专题访问记。这篇题为《人圈》的专题访问开篇即谓：“从 1941 年伪满洲国康德八年开始，敌人为了明朗热河，为了防止八路军的积极行动，实行了毒辣的集家并村政策。”^② 而且留存下来的日伪档案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由伪满军事部思想战研究部 1944 年 4 月编写的《西南地区治安问题之考察》明确说：西南地区的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系康德八年度（即 1941 年）始于丰宁县东卯地区及滦平县于营子一部分地区”。^③

但笔者认为，伪满最早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的时间应以 1939 年秋后较为妥当。佐证有二：

其一，早在 1939 年 9 月日本关东军就已经确立了在“西南防卫地区”制造“无人区”的方针。1939 年 6 月，日本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发出了“关于昭和十四年度中期以后西南防卫地区治安

① 兴隆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兴隆文史资料》第 2 辑，1988 年 5 月出版，第 90 页。

②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12 页。

③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 1991 年 4 月第 1 版，第 609 页。

肃正指示”，要求与武力“讨伐”并行，“迅速完善警备道路和通讯网，调查户口，收缴武器，分离匪民”，强调“治本工作和思想工作”与“讨匪并行，并与之相结合”。^①“指示”中所谓的“分离匪民”、“治本工作”显然就是要制造“无人区”。及至当年9月，“伪西南防卫委员会”成立后，更是把“无人区的划定、实施要领、规定禁止通行标志；拟定集家部落实施要领，移民计划，建立武装防卫部落”作为其首要任务之一。^②

其二，姚依林写于1940年的《冀东游击战争是怎样坚持的》一文也证实了这一点。文章说：敌人的五次“扫荡”失败（1938年9月到1939年春）后，又于1939年青纱帐倒后开始了第六次的“扫荡”，并在军事上又开始了新的布置。包括添修全境公路，以便敌机械化部队的运动；构筑新据点，经过据点不断的实行“清乡”，缩小我们的活动范围；“开始实行并村办法（我X队活动的热河南部承德附近，并村的办法已开始实行），企图减少甚至消灭山沟小道中三五户的小村庄，便于其军事政治的控制，增多我游击队活动的困难”。^③明确指出了敌人开始制造“无人区”是在“1939年青纱帐倒后”。

以上两点相互印证，基本上可以确定日本关东军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始于1939年秋后。

在华北地区，过去学术界一般地是依据战犯铃木启久的供述，

-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4月第1版，第598-599页。
② 高木贞次等二十人笔述，1954年12月27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4月第1版，第616页。
③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29-30页。

认为日军在长城内侧制造“无人区”始于 1942 年 9 月。^① 但根据笔者在南京档案馆发现的一份档案,华北日军早在 1941 年 4 月以前,即已开始在冀东长城内侧制造“无人区”。现将该档案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冀东丰润县商民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一件^②

(1941 年 4 月 16 日)

窃本处地当丰润边区边陲,山脉连亘,黎民以农为业,各安所职。溯自二十七年匪变以来,兵燹相循至今,时已三载,所遭蹂躏实较平原地带为最,幸赖我皇军本睦邻之本旨,力谋促进东亚于和平,迭次讨伐,遂使一切政治逐渐恢复。……惟我皇军到境时,偶见匪踪,当即大施扫荡,村民正庆重睹天日,治安有望。殊不料皇军竟以被匪害之地带为匪区,则被匪害之村庄竟认为通匪之村庄,被匪害之人民竟认为通匪之人民,房舍或被焚毁,人民或遭屠杀,……今本处被皇军惩治之下,被烧杀者有之(如丰润县潘家峪村男女共一千四百余口只余他往者百余口,被伤未死者百余口,房千余间仅余五六十间。又吴水□房千余间亦几□被焚毁),奉令全村迁徙者有之(如杨家营、郭庄子、刘家营等村现已迁居十里以外),其被烧杀之处,则房舍丘墟,尸骸遍野,虽余少数之未死者,亦莫不焦头烂额,手折足伤,其迁徙者则田地荒芜,房舍空阔,壮者尚可出而

① 参见铃木启久:《我在冀东任职期间的军事行动》,《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 12 辑,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出版;铃木启久口供记录,1955 年 5 月 6 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冀东丰润县商民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一件》,1941 年 4 月。原件存南京档案馆。

奔命，老幼莫不倒卧于沟壑之间。伏思虽无兄弟如手如足，谁无夫妇如宾如友，遽遭惨杀，则互视不能聚首；谁无房舍，谁无财产，遽遭烧毁，将何以为生，此情此景实不堪举目。思之痛心，言之堕泪。困之民等所余之村庄莫不惊悸亡魂，人心惶恐，既虑匪之再来，又畏皇军之骤至，一日散惊奔波无定，长此以往将何以堪，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则一方之民将无所口余矣。

上述档案内容中对抗日武装的诋毁之辞，以及由于日军的残暴行径给当地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自不待言，但从文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一）凡八路军活动的区域，日军即指定为“匪区”，施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这是日军企图以武力扫荡彻底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是日军制造“无人区”的最基本的方针。

（二）文中虽然没有出现“无人区”字样，但“奉令全村迁徙者有之”，其目的显然就是制造“无人区”，以实现其所谓“匪民分离”，彻底切断抗日根据地与游击区、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

所以，由这份档案可以断定，日本华北方面军在长城内侧开始制造“无人区”应在1941年4月之前。

三 日军在华北制造“无人区”的主要办法

通常人们一提及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就会联想到“集家并村”，以为制造“无人区”，就是“集家并村”。其实，“集家并村”只是日军在局部地区实行的制造“无人区”的一种办法。

根据档案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日军在华北制造“无人区”，大体实行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用武力,即通过“三光作战”,将划定为“无人区”的原住百姓驱赶到其所谓的治安区,之后由群众自行选择去向,并不强制进行集中管理。如在晋东北的盂县境内,1941年9月日军第四旅团片山旅团长发出设置“无人区”布告,在划定“无人住地带”范围及“烬灭实行时期”的同时,强令“凡布告指定各村村民,据依照左记各项迅速完全到指定地外居住。”或到“亲戚或本族家内暂住”;或“赶快到治安确立区域附近村庄(主持)搬住”,或“阳泉、寿阳设有各种工厂,如愿做工者到所管辖公署及区公所报告为荷,凡原做工的人,准将本家族带了同去”。^①在长城内侧,1942年9月华北日军制造“无人区”时,也只是做出规定:“沿长城线4公里的遵化、迁安两县地区的居民,一律撵走,严禁在此地区耕作或通行。”^②又如在冀西的平山、灵寿、曲阳等地,日军在挖成封锁沟后,规定沟外5至10里之内为“无人区”,大肆焚烧屠杀,逼迫群众离开。此外,晋中、晋西北、山东等地的“无人区”也大都属于此类。“无人区”的群众除少数继续坚持斗争,大都被迫忍饿挨冻,流落他乡。

另一种办法就是武力“集家并村”,实行集中强制管理。这一办法主要是在长城外侧实行,是日本关东军在长城外侧制造“无人区”的中心环节。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办法“把支援敌人的民众从敌人夺过来,而归顺于我方”。^③日伪将“无人区”内的村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无住禁作地带”,这些地带多是靠近深山地区,不许居住、通行,不许耕作、放牧,违者格杀勿论;第二类为“无住地带”,

① 《日军第四混成旅团片山旅团长关于设立“无人住地带”的布告》,1941年9月。载盂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盂县县志》,1995年12月第1版。

② 铃木启久:《我在冀东任职期间的军事行动》,《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③ 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编:《灭共对策资料》,1942年10月。

这些地带多为半山区,这一地区可以种地、放牧,但不许人居住;第三类为“集团部落”,日伪把“无住禁作地带”、“无住地带”的房屋全部拆毁,将人畜全部圈进“集团部落”。具体而言,其办法是:第一阶段,先把三家五家太分散的零碎户集中到村庄里。这是“命令”,不去就是烧、杀、抢!第二阶段,是把所有的小村子都集中在离长城四十里以外山沟口较大村里,名之曰“部落”。^①

当然,通过“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办法也为华北日军所搬用。如在晋东北,1941年秋日军将五台县三区划分成三个区,北黑山屯至兰家庄这一带的老乡被集中于沙崖、兰家庄山下;东峪里、里外河府一带的老乡被集中于东峪口;陡寺以上至南坡一带的老乡则被集中于王城。^②而在整个五台县,日军将“无人区”148个大小村庄的居民全部迁往“治安区”的东峪口、高洪口、河北、松岩口、横岭、门限石、狐峪口、石咀等30多个村子里。造成“无人区”以后,敌人在“无人区”边缘增设据点,挖沟修路,封锁交通;还建立伪政权、自卫团、特务组织,发展密谍、汉奸,控制群众自由行动;群众则每人发给一张“良民证”,没有“良民证”的就是“通匪”;更毒辣的是在各“治安村”建立联保制,凡有一户人回村,就得有10户受株连。^③至1942年华北日军开始在长城内侧制造“无人区”时,在对待一些根据地的群众时,也采取搞集家点的办法。如迁西县大韦庄附近19个村2000多户1万多口人,被强迫搬到一条空旷的大山沟里,家家户户搭的茅草窝棚,挨挨挤挤连成了一条五里长街。^④

① 《日寇侵华暴行录》,1951年4月联合书店出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敌寇“治安强化”下的五台三区》,《晋察冀日报》1941年10月22日。

③ 《五台县“无人区”三年的史实》,《五台文史资料》第2辑。

④ 参见陈平《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55-56页。

四 关于热河省被集家户数、人数

日军在原热河省制造“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大搞集团部落，究竟被集了多少户、多少人？史学工作者多年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许多较为可信的数据，但总的来说，还较为零碎，缺乏一个完整、准确可靠的统计数字。笔者近期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一些新的档案材料，有助于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抗日战争时期的热河省属“伪满洲国”的版图，其南部、西部长城沿线的广大地区是“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地区。伪满当局为了阻断长城内外抗日武装力量的联系，“封死中共党政对满洲国的侵略进攻”，确保“伪满洲国”的“治安”，自 1939 年秋后即开始在热河长城沿线武力强制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并且规模愈来愈大，其中又尤以所谓“国境五县”（丰宁、滦平、承德、兴隆、青龙）受灾最为深重。下面是中共承德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暴行与血泪》中的“日军在原承德地区集家并村和制造‘无人区’概况表”^①：

县 别	兴 隆	青 龙	承 德	丰 宁	滦 平	隆 化	合 计	
全 县	总面积(平方公里)	3,690	3,310		8,765	3,215	6,102	25,082
	自然村数	2,500	1,686		2,517	1,199	1,150	9,052
	户数	30,275	45,980		33,650	43,574	29,010	182,489
	人口	137,885	229,879		169,267	245,410	107,226	889,667

① 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 1991 年 4 月第 1 版，第 772 页。

县别	兴隆	青龙	承德	丰宁	滦平	隆化	合计
部落数	199	358	448	277	543	114	1,939
自然村数	2,000	1,219		2,265	720	460	6,684 [6,664]
户数	22,216	33,231		30,285	25,648	8,200	119,580
人口	111,825	166,199		152,243	128,240	430,000	601,507 [988,507]
划无人区面积(平方公里)	1,301	2,400		2,000	230	30	5,961
占总面积%	40	72.5		23.1 [22.8]	7.2	0.5	23.8

从上表可以大略看到“国境五县”(缺承德县)的受灾情况。但由于系建国后征集而来,某些数字难免不够准确,而且也缺乏其它县份的统计数字,因此还不能较准确地反映热河省被集户口、人数的全貌。笔者根据形成于1946年的档案材料,研究确认,抗战时期热河省共有214179户,1070895人被集家,分别占总户数、总人口的33.4%和28.7%。其中各县被集户数、人数及所占百分比,详见下表^①。

敌伪时期热河集团部落被集户数人数比较表(1946年)

县别	户数			人数			附注
	总数	被集数	%	总数	被集数	%	
承德县	56,462	30,076	54	320,894	150,380	46	
兴隆县	28,940	22,365	77	138,939	111,825	80	
滦平县	43,574	39,947	92	245,411	199,735	81	
丰宁县	50,930	28,032	55	254,683	140,160	55	
隆化县	33,511	8,514	25	192,552	42,570	22	
围场县	52,581	3,135	6	272,226	15,675	6	
青龙县	71,188	43,260	61	439,600	216,300	49	

① 《敌伪时期热河集团部落被集户数人数比较表》,1946年,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县 别	户 数			人 数			附注
	总 数	被集数	%	总 数	被集数	%	
建平县 (喀右)	88,757	9,800	11	580,635	49,000	8	
平泉县 (喀中)	87,532	11,570	13	499,019	57,850	11	
凌源县 (喀左)	128,039	17,480	14	781,940	87,400	11	
总 计	641,514	214,179	33.4	3,725,899	1,070,895	28.7	

另据当年的《热河抗日简史》记载称：“伪热河省四百万人口，有一百零五万人被敌驱入人圈。”^① 与上表中所列总人数基本相符。因此，可以认为，上述档案中所记数字比较可靠的。

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了广大的“无人区”，使华北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但迄今缺乏较为全面准确的统计资料。弄清楚热河“无人区”的基本统计数字，对于解决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申玉山,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赵志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责任编辑: 刘 兵)

① 转引自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编:《河北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5月第1版, 第511页。